

论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思想嬗变与学术争议*

曹峰毓 王文旗

【提要】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史学的重要流派。20世纪60年代,在特伦斯·兰杰等学者的努力下,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正式建立。通过深化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思想和拓展其方法论,以及建立历史人才培养体系,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极大推动了非洲史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其指导思想逐渐转向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并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思想展开激烈批判。20世纪80年代末,该学派进入了新阶段,在史学思想与方法论方面进一步突破,关注议题显著增加,学术交流平台也日趋完善。虽然该学派为非洲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饱受批评,如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缺少原创性指导思想和学术思想未能充分指导实践等。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史学的缩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下实现非洲史学的复兴已成为非洲各界值得深入思考的历史命题。

【关键词】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非洲史学 民族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坦桑尼亚

20世纪50年代后非洲国家陆续取得独立,中国学界也开始了对该地区史学发展的持续关注。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洲著名历史学家及其思想、^①非洲专门史,^②以及非洲史学的总体发展脉络^③等方面。其中,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与伊巴丹学派、达喀尔学派并称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三大流派,在很多文献中有所涉及。^④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该学派的研究多散见于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⑤或对该学派著名史学家^⑥的研究,仅有李安山对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专题分析,^⑦该学派日后的思想嬗变及其相关学术争议等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在此情况下,本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衰落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23M732839)的阶段性成果。

- ① 曹峰毓、后黎:《论肯尼思·翁伍卡·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刘鸿武、王严:《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 A. 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及史学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张忠祥:《阿杜·博亨与非洲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 ② 邓荣秀:《论非洲技术史研究的多重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8期;张忠祥:《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李鹏涛:《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郑晓霞:《书写“她”历史——非洲妇女史的兴起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 ③ 张永宏、王涛:《非洲历史的整合与分割——非洲史研究的当代走向》,《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严:《当代非洲史学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年。
- ④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 ⑤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 ⑥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 ⑦ 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文结合学界已有研究,在对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史学理念的转变,并以此为基础对非洲史学的当代发展进行反思。

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早期发展

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原属英国托管地的坦噶尼喀于1961年5月取得自治地位,并于同年12月宣告独立。与此同时,在时任坦噶尼喀^①总理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的支持下,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ar es Salaam)于1961年10月建立,尼雷尔兼任首届院长。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在成立之初属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附属学院,规模极小,仅有一个法学系,13名学生。1964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的历史系才正式设立。^②

(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建立

20世纪60年代初,坦桑尼亚几乎没有接受过完整史学训练的本土学者,外国学者成为推动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发展的主要力量。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的历史系在成立时只有英国学者特伦斯·兰杰(Terrance O. Ranger)一名教授及两名从北美留学归来的坦桑尼亚学者——赛亚·基曼博(Isaria N. Kimambo)与阿诺德·特姆(Arnold Temu)。^③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随后招募了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约翰·麦克莱肯(John McCracken)等西方学者。^④在上述学者努力下,1965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作为东道主举办了国际非洲历史学家会议。^⑤次年,坦桑尼亚历史学会(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宣告成立。该机构的建立为该国历史学界日后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

坦桑尼亚历史学会在成立初期尚无力发行学术期刊,但仍在1966—1969年发表了《东非海岸:历史与考古回顾》(*The East African Coast: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view*)、《西非和大西洋奴隶贸易》(*West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Slave-Trade*)等系列论文。^⑥随后,以坦桑尼亚历史学会的会议论文为基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1968—1969年间先后出版了三部重要历史专著,即《中非历史的多个方面》(*Aspects of Central African History*)、《1900年前的坦桑尼亚》(*Tanzania Before 1900*)和《坦桑尼亚史》(*A History of Tanzania*),^⑦提出了诸多重要观点。例如,《中非历史的多个方面》指出,非洲人对奴隶贸易、传教士与殖民统治的反应和其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且这种反应模式一直持续至今并影响着当前非洲的政治运动。^⑧《1900年前的坦桑尼亚》涉及坦桑尼亚数代时间各部落

① 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于1964年合并为今天的坦桑尼亚。

②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College of Humanities, "College History". <https://www.udsm.ac.tz/web/index.php/colleges/cohu/college-history> [2023-06-13]

③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in Bogumil Jewsiewicki, David Newbury, eds., *African Historiographies: 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 SAGE Publication, 1986, p. 253.

④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⑤ 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在1968年出版,名为《非洲历史中的新兴主题》(*Emerging themes in African History*)。参见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第51页;T. O. Ranger, ed.,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Proceedings*, East Africa Publishing House, 1968。

⑥ John Lonsdale,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0, No. 3, 1969, p. 517.

⑦ Isaria N. Kimamb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Tanzania Zamani*, Vol. 9, No. 2, 2017, p. 223.

⑧ J. R. G.,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0, No. 1, 1969, p. 178.

的相互接触及由此产生的“对‘部落’身份的更大意识”。^①《坦桑尼亚史》的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的奥杜维文化(Oldowan)至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的颁布,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②该著作在整体梳理坦桑尼亚历史的同时,也正式确立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主题和方向。^③

这一时期,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另一工作重点是研究非洲本土的抵抗运动。该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兰杰在1967年出版的《南罗德西亚的反抗》(*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主要关注19世纪90年代南罗得西亚人对白人占领者的抵抗活动。^④约翰·伊利夫在1969年出版的《德国统治下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 under German Rule*)提出,1905—1907年爆发的“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是迫使德国改变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此次起义后,部分非洲人通过接受西方教育与种植经济作物等方式实现现代化,并试图以此与殖民者平等竞争。^⑤

(二)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早期成就

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性流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非洲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深化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思想。非洲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⑥所谓的非洲史研究多是以非洲人为客体,探讨的却是“外来民族对非洲的殖民史”。^⑦非洲本土学者为纠正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不懈努力,尼日利亚的肯尼思·翁伍卡·迪凯(Kenneth Onwuka Dike)等史学家在该领域做了最早的开创性工作。^⑧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进一步发展了非洲的民族主义史学。该学派的研究成果均有一个核心观点,即探讨“非洲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认为“非洲人”才是非洲历史的主要推动者。这也间接证明了非洲本土人民能在变革世界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⑨有学者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内容归为以下五点: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历史、关注殖民统治时期的原始抵抗、研究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注重新的受教育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发掘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⑩其中,针对非洲本土的抵抗运动,兰杰提出了“原始抵抗”(Primary Resistance)概念,以代指非洲人对欧洲殖民者的早期反抗。他强调不应将这种抵抗看成是落后的,反而认为其与1945年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存在直接联系。^⑪这在赋予“原始抵抗”运动合法性的同时,也强调了非洲历史的

① C. F. Holmes, “Tanzania Before 1900”,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1970, pp. 204–205.

② Isaria N. Kimambo, A. J. Temu, *A History of Tanzani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1969.

③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④ T. O.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⑤ John Iliffe, *Tanganyika Under German Rule 1905–19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Terry H. Elkiss, “Colonial Tanganyik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13, No. 2, 1970, pp. 315–316.

⑥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⑦ Ebere Nwaubani, “Kenneth Onwuka Dike, ‘Trade and Politic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frican in History”, *History in Africa*, Vol. 27, 2000, p. 242.

⑧ 曹峰毓、后黎:《论肯尼思·翁伍卡·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⑨ Terence Ranger,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 An Answer”, *African Affairs*, Vol. 70, No. 278, 1971, pp. 53, 59, 60.

⑩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⑪ T. O. Ranger, “Connex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9, No. 3, pp. 437–453; T. O. Ranger, “Connex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I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9, No. 4, 1968, pp. 631–641;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连续性。

第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进一步拓展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对口述史料的大量使用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一大重要突破。文字长期被认为是历史研究唯一可靠的史料来源,但非洲严重缺乏本土文字史料。在此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后,部分非洲学者开始将口述史料引入研究。^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而言,口述史料在其研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正是在1965年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召开的国际非洲历史学家会议上,“口头传说”被确立为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史料。这证明非洲史研究大量使用口述史料的做法已被国际史学界普遍接受。^②

除对口述史料的大量运用,兰杰等人还开创了解读殖民档案的新方法。《南罗德西亚的反抗》一书的资料收集工作主要是他在罗得西亚工作期间完成的。由于发表了激进言论,兰杰的行动遭到殖民当局的严厉限制,无法收集口述史料。在此情况下,他只能通过“逆向解读”的方式理解非洲人对欧洲统治的回应。^③这种对殖民档案的全新解读使学者能够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重塑“底层的历史”。

第三,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非洲建立了重要的历史人才的培养平台。前文已述,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成立初期,坦桑尼亚极度缺乏历史人才,兰杰等西方学者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主要初始成员。不过,此后不久,作为东非地区少有的历史研究机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迅速吸引了大量非洲本土学者加入。较为著名的有来自圭亚那的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和来自刚果(金)的雅克·德佩尔钦(Jacques Depelchin)。^④此外,赛亚·基曼博、阿诺德·特姆等坦桑尼亚本土学者也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得到快速发展,基曼博成为该校首位坦桑尼亚籍历史教授。^⑤

历史教学也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建立初期的重要工作。兰杰任职初就编写了以非洲史为核心的教学大纲,特意包含了三门涉及其他地区的课程,即“历史学家与革命”“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印度和爱尔兰”和“工业国家的崛起”,以便使学生们熟悉古典史学辩论,加深对民族主义的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⑥此外,该学派还积极参与坦桑尼亚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由于缺乏本土教材,殖民时期的教科书在独立初期仍被大量沿用。^⑦因此,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早期出版的大量成果均有意用简单语言编写,以支持中学教学与教师培训,^⑧部分论文还被译成斯瓦希里语以便于乡村地区的历史教学。^⑨

① C. J. Korieh, “Africa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N. L. Njoku, ed.,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 African (ist) Perspective*, Goldline Publishing Services, 2008, p. 22.

② 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第51页。

③ Diana Jeater, “Stuff Happens, and People Make It Happ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ork of Terence Ranger”,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73, No. 1, 2012, p. 198; 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④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⑤ The Tanzania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 Isaria Kimambo”. <https://www.taas-online.or.tz/members/view/prof-isaria-kimambo> [2023-02-22]

⑥ John McCracken, “Terry Ranger: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2, 1997, pp. 179, 180.

⑦ E. Wamba-dia-Wamba, “African History & Teaching of History In Dar es Salaam”, *Tanzania Zamanin*, Vol. 1, No. 3, 1993, p. 9.

⑧ Isaria N. Kimamb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 223.

⑨ Isaria N. Kimamb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 224.

二、向“新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转型

1969年,兰杰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1970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转变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为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对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批判。有学者称之为“新达累斯萨拉姆学派”(New Dar es Salaam School)。^①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转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坦桑尼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又受到非洲史学整体发展的影响。一方面,为摆脱独立后的发展困境,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1967年1月发表了名为《阿鲁沙宣言》的“社会发展纲领”,正式宣布坦桑尼亚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同年3月,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指出大学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应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遏制精英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② 政治环境的变动成为推动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思想转型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发展困境对民族主义史学造成了严重冲击,以往将社会发展滞后归咎于殖民统治的观点已逐渐失去了解释力。事实证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尚缺乏自主发展的经济基础,而民族主义史学难以解释其面临的经济问题,致使非洲史学陷入了严重的学术危机。在此情况下,非洲史学诸流派均出现了批判民族主义史学并加强经济史研究的趋势。^③ 整体学术环境的改变也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思想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一) 指导思想的转变

指导思想逐渐由民族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重要变化。其中,沃尔特·罗德尼主要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他在1972年出版了著名的《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一书。^④ 该书被认为是继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⑤后对非洲和黑人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并直接影响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以后的研究方向。^⑥ 在书中,罗德尼将非洲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归为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由非洲劳动力以非洲资源创造的财富正在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又对非洲的能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经济潜力。此外,罗德尼也指出“这一制度的控制者、制度的代理人及其帮凶”对非洲的欠发达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非洲只有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才能摆脱被剥削的命运。^⑦

不过,学者们逐渐发现了依附论在具体应用中的两个问题:一方面它无法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

① Esperanza Brizuela-García, “The History of Africanization and the Africanization of History”, *History in Africa*, Vol. 33, No. 1, 2006, pp. 92–93.

② Michelle Elise Bourbonniere, *Debating Socialism on the Hill: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61–1971*, Halifax/Dalhousie University, 2007, p. 97.

③ 例如,伊巴丹学派的思想转型。参见王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④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2.

⑤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⑥ 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⑦ 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李安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41、85页。

系出现前的非洲历史,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后非洲的内部发展。^①因此,大多数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学者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坦桑尼亚的阶级斗争问题。约翰·伊利夫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该领域的代表。1970年,伊利夫发表了《达累斯萨拉姆码头工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Dockworkers of Dar es Salaam)一文。^②在该文中,伊利夫以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工人为例,关注了坦桑尼亚劳工历史的早期阶段。他着重探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码头工人群体意识的产生及阶级斗争,并尤为强调这些斗争是在没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刺激下发生的。^③1971年和1979年,伊利夫分别出版了《现代坦噶尼喀的农业变化》(Agri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Tanganyika)^④和《坦噶尼喀现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⑤两本专著,将坦桑尼亚贫困的根源归结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当地社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是坦桑尼亚现代历史的主题。《坦噶尼喀现代史》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最精致的作品。^⑥1987年,伊利夫又出版了《非洲的穷人:一部历史》(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⑦该书获得1988年赫斯科维茨奖(Herskovits Prize),^⑧这是一部比较研究非洲各国贫困阶层的社会史著作,对贫困、权力以及各种生产方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另一位需要重点关注的学者是伊萨·希夫吉(Issa G. Shivji)。他于1970年在《火花》(Chech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无声的阶级斗争》(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的长文。希夫吉指出,坦桑尼亚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次要矛盾是官僚资产阶级和革命领导层的矛盾。虽然尼雷尔已提出在坦桑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地位正在逐渐强化。^⑨此后,他又通过《坦桑尼亚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和《坦桑尼亚:阶级斗争仍在继续》(Tanzania: The Class Struggle Continues)等作品进一步论述了上述观点。^⑩这些成果引起了坦桑尼亚学界对该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广泛讨论。^⑪例如,沃尔特·罗德尼认为,坦桑尼亚和非洲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将是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关键是非洲的小资产阶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附并转化为工人。^⑫约翰·索尔(John Saul)指出,虽然帝国主义是国家发展面

① Bethwell A. Ogot, "African Historiography: From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to UNESCO's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n Bethwell A. Ogot,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Afric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einemann, p. 73.

② John Iliffe, "A History of the Dockworkers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Vol. 71, 1970, pp. 119-148. 此文于1975年被收录在《非洲工人阶级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ican Working Class)一书中,题目改为《1929—1950年达累斯萨拉姆码头工人群体意识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Group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Dockworkers of Dar es Salaam 1929-1950)。

③ John Iliffe, "The Creation of Group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Dockworkers of Dar es Salaam 1929-1950", in Richard Sandbrook, Robin Cohen, ed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ican Working Class*, Longman, 1975, pp. 49-50.

④ John Iliffe, *Agri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Tanganyika: An Outline History*,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71.

⑤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⑥ Gregory H. Maddox,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of African History". <https://oxfordre.com/africanhistory/display/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34.001.0001/acrefore-9780190277734-e-314>[2023-05-30]

⑦ John Iliffe,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⑧ 赫斯科维茨奖是由非洲研究协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颁发的年度奖项,奖励前一年以英文出版并在美国发行的有关非洲的最佳学术作品。该奖项以非洲研究协会创始人之一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的名字命名。

⑨ Issa G. Shivji,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in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3, pp. 37-38.

⑩ Issa G. Shivji, *Tanzania: The Class Struggle Continues*, United Nations Afric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1974; Issa G. Shivji,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Heinemann, 1976.

⑪ 对该问题的部分讨论与伊萨·希夫吉的论文被一同汇编为论文集,并以《无声的阶级斗争》为题由坦桑尼亚出版社出版。参见 Issa G. Shivji, "Publisher's Note", in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p. vi.

⑫ Walter Rodney,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Question of Disengagement from Imperialism", in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p. 68.

临的根本阻碍,但在哪个阶级控制国家的问题没有解决前,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反对帝国主义上是错误的。在此情况下,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可能仅停留在宣传上,而民族主义口号会被机会主义者操纵。^①

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他学者也加入相关问题的探讨。例如,在《殖民统治下的坦桑尼亚》(*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②和《殖民统治下的桑给巴尔》(*Zanzibar under Colonial Rule*)^③中,阿诺德·特姆、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B. D. 鲍尔斯(B. D. Bowles)、M. H. Y. 肯尼基(M. H. Y. Kaniki)等学者讨论了利用唯物主义方法对坦桑尼亚历史进行研究。^④阿卜杜勒·谢里夫(Abdul Sheriff)还着重研究了18—19世纪商业资本对东非的渗透及其造成的政治影响。^⑤

此外,随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愈发深入,很多学者也注意到相关史学理论问题。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重点关注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欧洲与仍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非洲的特殊生产关系,系统探讨了意识形态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影响。^⑥亨利·斯莱特(Henry Slater)指出,历史知识的生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还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干预,历史学者应积极探索并接受相关方法,以便完成这一意识形态任务。^⑦雅克·德佩尔钦(Jacques Depelchin)与亨利·伯恩斯坦合著的长文《非洲历史的对象:唯物主义的观点》(*The Object of African History: A Materialist Perspective*)也部分涉及该问题。他们指出,非洲的历史学者在方法论上过度关注收集、评价数据,而未对历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两人着重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唯物主义历史(Materialist History)的关系,强调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社会知识生产方面的“根本不兼容性”,并讨论了唯物主义视角下非洲史学的发展方向。^⑧

(二)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

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指导思想逐步转向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后,该学派从理论与应用层面对原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这一过程也可看成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其原有史学理念的反思。

在理论层面,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认识论。相关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多是经验主义的,即试图通过对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呈现非洲历史的演进,拒绝采用分析方法且忽视理论归纳。这导致其研究结论过于肤浅,无助深刻理解过去。阿诺德·特姆和博纳旺蒂尔·苏瓦伊(Bonaventure Swai)将其称为“缺乏宏观视野的对细节的迂腐

① John Saul, “Who is the Immediate Enemy?”, in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1973, p. 73.

② M.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gman, 1980.

③ Abdul Sheriff, Ed Ferguson, eds., *Zanzibar under Colonial Rule*, James Currey, 1991.

④ Henry Slater,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t Dar es Salaam: Thoughts on Two Recent Histories of Tanzania”, *Tanzania Zamani*, Vol. 1, No. 2, 1992, pp. 127 – 128.

⑤ Abdul Sheriff,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⑥ Jacques Depelchin, “Af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of Exploitativ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frica Development*, Vol. 2, No. 1, 1977, p. 43.

⑦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8.

⑧ Henry Bernstein, Jacques Depelchin, “The Object of African History: A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History in Africa*, Vol. 5, No. 1, 1978, p. 2.

研究”。^①

同时,民族主义史学对非洲人历史主体性的过度关注也使之陷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问题实际是由主观取向决定的,即非洲历史研究究竟是以欧洲还是非洲为中心,而这实质是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②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非洲历史的“浪漫化”:一方面忽视了前殖民时代非洲本土政权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夸大了非洲人在殖民统治下的主动性和适应性。与殖民主义史学一样,这也是对历史的扭曲。亨利·斯莱特将民族主义史学评价为“在社会真空中孕育的政治”。^③

在应用层面,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批评民族主义史学无法对非洲的发展困境提供有效帮助,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关注点过于单一。为赋予非洲独立运动合法性,政治史及前殖民时代非洲本土的政治精英成为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强调本土力量对非洲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欧内斯特·万巴(Ernest Wamba)称之为“为新的统治阶级量身定做的历史”。^④然而,在面对独立后产生的发展问题时,这种研究取向的弊端很快显露。

对政治事务的过度关注导致民族主义史学忽视了非洲发展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面对独立后日渐滞后的社会发展,“欠发达之下的发展”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的培育”成为非洲研究致力解决的问题,相关探讨也逐渐由政治上层建筑转移到经济基础。学界不再强调本土政治力量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聚焦于欧洲资本代理人对非洲的渗透问题。面对这一研究取向的转变,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难以发挥关键作用。^⑤

相比之下,对本土政治精英的过度关注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殖民制度的忽视。在夸大非洲人历史主体性的同时,部分民族主义史学家还倾向于淡化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例如,伊巴丹学派的史学家阿德·阿贾伊(J. F. Ade Ajayi)提出了著名的“插曲论”。他将殖民统治比喻为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认为其与班图人大迁徙、伊斯兰教的渗透等一样只是历史事件。^⑥这导致民族主义史学很少对殖民制度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为寻找独立后非洲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仍未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深入理解殖民问题是十分必要的。^⑦正是这些在民族主义史学中被掩盖的殖民制度,成为非洲人被剥削的工具。^⑧

第二个问题是对非洲底层民众的忽视。虽然民族主义史学声称突出非洲人的历史主体性,但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贵族式的历史观,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在相关研究中基本是缺失的。^⑨亨利·斯莱特认为,这种研究取向错误地描述了非洲的力量来源,反而成为现实中动员民众的巨大阻碍。^⑩

① Arnold J. Temu, Bonaventure Swai, *Historians and Africanist History: A Critique*, Zed Press, 1981, p. 3.

② Jacques Depelchin, “Af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of Exploitativ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 45.

③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4.

④ E. Wamba-dia-Wamba, “African History & Teaching of History in Dar es Salaam”, p. 17.

⑤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5.

⑥ 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⑦ J. I. Dibua, “The Idol, Its Worshipers, and the Crisis of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Nigeria”, *History in Africa*, Vol. 24, No. 1, 1997, p. 126.

⑧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5.

⑨ Toyin Falola, Saheed Aderinto, *Nigeria, Nationalism, and Writing Histor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p. 238.

⑩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4.

三、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当代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由尼雷尔倡导实施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改革被证明与坦桑尼亚的发展实际脱节而陷入停滞。同时,乌坦战争、世界性经济衰退等外部环境的不利进一步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坦桑尼亚被迫开始在西方国家的指导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逐步推行一系列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改革。^①同一时期爆发的苏东剧变更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坦桑尼亚造成了极大冲击。新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核心地位。

不过,“结构调整计划”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坦桑尼亚面临的发展问题。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坦桑尼亚的经济危机,但也削弱了该国经济建设的自主权,严重的贪腐与贫困问题也未得到显著改善。就整个非洲而言,大量实施相关计划的国家不但经济状况未现好转,反而经济萧条加剧并导致社会动荡。因此,非洲学界开始反思西方理论对于非洲的适用性,主张基于非洲的实际情况设定发展道路。^②这也促使达累斯萨拉姆学派逐渐改变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从而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 史学思想与方法论上的突破

该阶段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以往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再次反思。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史学虽被证明有严重弊端,但至少突出非洲人的历史主体性上有积极意义。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虽揭示了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剥削,但更倾向将非洲描述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循环过程的被动受害者。^③在此情况下,以赛亚·基曼博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实现两种史学思想的融合。

基曼博在1969年出版了《帕雷人的政治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一书,^④该书属于民族主义史学的典型作品。在调整研究视角并增补了相关资料后,基曼博于1991年又出版了《坦桑尼亚的渗透和抗议:世界经济对帕雷人的影响,1860—1960》(*Penetration and Protest in Tanzania: the Impact of World Economy on the Pare, 1860 - 1960*)。^⑤该书虽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对帕雷人的负面影响,但也将他们视为此种挑战下的积极行动者,阐释了其应对资本主义渗透做出的一系列努力。该书证明,即使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后,非洲人依然可被视为历史进程的重要塑造者。

在方法论层面,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将殖民档案与口述史料整合。早期的学者认为,殖民地撰写的记录只代表殖民地的观点。^⑥学者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通过对其进行批判性阅读并结合口述史料,同样能揭示非洲人的思想和实践。这一改变无疑增加了非洲史研

① 李鹏涛:《坦桑尼亚革命党的角色转变及其面临的挑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② 王严:《当代非洲史学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年。

③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Tanzania Zamani*, Vol. 9, No. 2, 2017, p. 64.

④ Isaria N. Kimambo,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c. 1500 - 1900*,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9.

⑤ Isaria N. Kimambo, *Penetration and Protest in Tanzania: the Impact of World Economy on the Pare, 1860 - 1960*, James Currey Publishers, 1991.

⑥ H. 科恰科娃:《非洲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六十一七十年代)》,井寒译,《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

究可用的史料范围。该阶段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大量研究运用了此种方法。例如,奥西安娜·姆瓦基库蒂(Osiana Mwakikuti)通过结合殖民档案和伦格威(Rungwe)地区尼亚库萨(Nyakyusa)部落长老的访谈资料,分析了丈夫作为移民劳工前往南部非洲情况下当地妇女的应对策略。尤斯托·姆万德特(Yusto Mwandete)通过仔细阅读殖民档案,并以口述史料为佐证,揭示了姆贝亚镇的萨夫瓦人(Safwa)对殖民政府环境保护计划的抗议活动。加西亚诺·苏拜(Gasiano Sumbai)研究坦桑尼亚中部饥荒时,也通过对这两种史料的结合,揭示了粮食短缺情况下当地社区的生存策略。^①

(二)关注议题显著增加

该阶段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另一个主要变化体现在其关注的议题。与之前主要关注政治或经济史不同,20世纪90年代后,该学派开始着重关注环境、医疗卫生、宗教等与非洲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面对非洲部分地区严重的环境退化现象,环境史逐渐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关注对象。1996年,伊萨里亚·基曼博、格雷戈里·马多克斯(Gregory Maddox)和詹姆斯·吉布林(James Giblin)共同出版了《土地的守护者:坦桑尼亚历史中的生态与文化》(*Custodians of the Land: Ec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Tanzania*),^②标志着环境史研究开始在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占据一定位置。基曼博对坦桑尼亚东北部的环境与饥饿问题进行了专题阐述。此后,乔治·安宾德威尔(George Ambindwile)等学者着重探讨了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③罗伯特·奥詹博(Robert Ojambo)以乌干达为例重点研究了与土地资源有关的冲突问题。^④

鉴于非洲落后的医疗条件,医疗卫生史也逐渐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重点研究方向。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有学者关注了坦桑尼亚的医疗卫生问题,^⑤但该方向在21世纪后才受到该学派的系统关注。2003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举行了关于非洲医疗卫生史的专题研讨会,^⑥优素福·拉维(Yusufu Lawi)、西蒙·梅萨基(Simeon Mesaki)、埃金纳德·米汉乔(Eginald Mihanjo)等学者对疾病与文化、本土医疗知识和社会经济政策、疾病的传播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⑦此后,奥斯瓦尔德·马塞博(Oswald Masebo)对殖民时期的儿童医疗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⑧穆萨·萨多

①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p. 56 - 57.

② James Giblin, Gregory Maddox and Isaria N. Kimambo, *Custodians of the Land: Ec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Tanzania*,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1 - 95.

③ George Ambindwile, *Rice F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Usungu Plains, Tanzania, 1920s - 200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2017.

④ Robert Ojambo, *The Land Question in Socio-Political Conflicts in Bukedi and Bugisu in Eastern Uganda, 1900 - 200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2017.

⑤ E. D. Ferguson,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Tanganyika", in M.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pp. 307 - 343.

⑥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 28.

⑦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 28.

⑧ Oswald Masebo, "Investing in the Health of Children: Stat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s, and Infant Welfare Interventions in Colonial Tanzania, 1920 - 1940", *Tanzania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18, No. 2, 2011;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p. 29 - 30.

克(Musa Sadock)对艾滋病、性病的传播与防治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①

此外,宗教冲突问题也引起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注意。虽然独立后坦桑尼亚的安全形势长期稳定,但有迹象表明宗教已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潜在诱因。穆罕默德·巴卡里(Mohammed Bakari)、阿蒙·查利加(Amon Chaligha)等学者在2006年出版的《正义、权利和崇拜:坦桑尼亚的宗教和政治》(*Justice, Rights and Worship: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一书,可看作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该领域的代表成果。该书对坦桑尼亚的宗教分布、宗教对该国政治的影响、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两者内部的宗教冲突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②

(三) 学术交流平台日趋完善

学术交流平台的日益完善也成为这一时期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重要特点。首要突破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史学期刊,名为《坦桑尼亚的过去》(*Tanzania Zamani*)。尽管筹办该期刊的设想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提出,并已确定了期刊名称,但由于资金等限制,该刊首期直到1992年1月才得以出版。^③ 该刊由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和坦桑尼亚历史学会共同主办,每年出版两期,一经创刊就成为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历史学者的重要发表平台。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上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坦桑尼亚历史学会的复兴。虽然该学会在1966年就宣告成立,并对坦桑尼亚建国初期的历史研究与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衰退,表现为年会无法按时召开,论文与专著出版几近停滞。1983年之后,坦桑尼亚历史学会出现过短暂复兴,并于1999年在内政部正式注册,但其活动在2001年后再次趋于停滞。2015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的不懈努力下,该组织终于重启年会制度,组建了新的领导机构并拟定了组织章程。目前,坦桑尼亚已有约四十所高校成立了历史系或类似组织。坦桑尼亚历史学会的复兴对于促进这些机构的学术交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④

此外,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也致力于自身学术平台建设。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每周一次的部门研讨会制度,参加者包括历史系教师、学生与访问学者,有时也会邀请坦桑尼亚国内外的知名史学专家。该研讨会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2015年,这一定期会议被正式命名为“伊萨里亚·基曼博研讨会”(IKHS),^⑤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参与者的论文手稿。有学者指出,虽然会上的部分成果未正式发表,但该研讨会仍有力地促进了坦桑尼亚史学研究的发展,它是该国史学界五十余年唯一未中断的交流平台。^⑥

① Musa Sadock, “‘Eating a Ripe Banana with its Skin on’: Health Education Campaigns against STDs and HIV/AIDS in Mbozi District, Tanzania, 1980s–2010”, *The Af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9, No. 1–2, 2012; Musa Sadock, *Histor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Mbozi District, Tanzania, 1905–200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2015; Musa Sadock, “HIV/AIDS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Mbozi District, Tanzania, 1980s–2014”, *Tanzania Zamani*, Vol. 8, No. 1, 2016.

②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 42.

③ Isaria N. Kimamb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 227; Sabinet African Journals, “Archive”. <https://journals.co.za/loi/zamani/group/d1990.y1992> [2023–06–15]

④ Isaria N. Kimamb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p. 245–247.

⑤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College of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https://www.udsm.ac.tz/web/index.php/colleges/cohu/departments-department-of-history> [2023–06–15]

⑥ Lorne Larson, “The Making of African History: Tanz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ttps://www.academia.edu/45085768/The_Making_of_African_History_Tanzania_in_the_Twentieth_Century [2023–06–20]

四、围绕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学术争议

不难看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确立非洲史观、发展口述史、培养非洲史学人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也促进了东非的地方史研究。不过,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也长期承受着学术界的广泛争议。毫不夸张地说,该学派是非洲史学主要流派中争议性最高的。总体而言,围绕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学术争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过度关注

反击西方学界对非洲历史的偏见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任务,因此,与其他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一样,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诞生之初即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该学派逐渐成为非洲史学意识形态倾向最强烈的一支。^①不过,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研究路径未能科学有效地指导历史研究,反而容易使研究者对历史事件赋予片面化的解释。

在发展初期,对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最著名的批评可能要数南非学者唐纳德·德龙(Donald Denoon)和亚当·库柏(Adam Kuper)在《非洲事物》(*Africa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他们指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重要缺陷在于将坦桑尼亚的历史等同于民族主义史,而忽视了其他相关因素。以这种前提为指导,非洲历史的大量议题,如非洲大陆内部的相互作用及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还导致该学派在史料的选择上不够全面。因意识形态不同,殖民时期人类学家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等大量成果很少被引用。^②德龙和库柏认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另一大问题是未对民族主义进行明确定义。这使民族主义与历史事件的关系难以被明确分析,导致众多现象被描述为与民族主义相关。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又使达累斯萨拉姆学者忽视了这种理论缺陷,导致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宣称的民族主义更多基于断言,而非经过实际证明。^③虽然特伦斯·兰杰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但就客观而言,德龙与库柏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言之有据的。^④

在指导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类似问题依然存在。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历史学家对非洲的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一度将其看成非洲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然而,他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非洲尚不存在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非洲的历史学家与无产阶级也缺少有机联系。^⑤在此情况下,欧内斯特·万巴质疑非洲是否能发展出真正的“无产阶级史学”。^⑥赛亚·基曼博遗憾地表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长期辩论阻碍了口述史料的收集

① 例如,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没有任何积极影响,认为后者是造成今天非洲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参见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Donald Denoon, Adam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 *African Affairs*, Vol. 69, No. 277, 1970, pp. 333 – 338.

③ Donald Denoon, Adam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 p. 338.

④ Terence Ranger,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 An Answer”, pp. 50 – 61.

⑤ Isaria N. Kimambo, “Three Decades of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t Dar Es Salaam”. <https://www.nzdl.org/cgi-bin/library> [2023 – 07 – 16]

⑥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8.

整理工作,无助于该学派的健康发展。^①

(二) 缺少原创性指导思想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虽提出过非洲人对殖民者的“原始抵抗”等重要概念,并在口述史等领域实现了诸多方法论突破,但一直未能发展出具有原创性且能够指导长远研究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上的贫困”与该学派的激进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初期占据指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虽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但它的思想内核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西方的影响。例如,民族主义史学对前殖民时代非洲本土国家的评价基本沿用了西方标准,认为帝国疆域越大,它的历史功绩也就越高。^② 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迪埃莱·阿菲博(Adiele E. Afigbo)由此反问,为何在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同时却赞扬本土的帝国主义? 如果民族主义史学的内核仅是反西方,它又与种族主义史学有何区别?^③ 此外,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思想,如对非洲人历史主体性的强调等,也是对殖民主义史学的简单反命题。^④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史学与其要反对的殖民主义史学采取的是同一种认识论内核,更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史学只是殖民主义史学的“消极镜像”。^⑤

20世纪70年代后,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开始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其他地区理论理解非洲的尝试。^⑥ 然而,在具体运用上,该学派不仅未能将外来理论与非洲本土情况有机结合,反而有陷入教条主义的趋势。例如,乔尔·萨莫夫(Joel Samoff)等学者指出,伊萨·希夫吉对坦桑尼亚阶级结构的划分不是根据对该国实际情况的考察,而是根据理论将其僵化地划分为大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富农和贫农,在分析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多是机械的,而非辩证。^⑦ 李安山也指出,不宜使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前殖民时期的某些非洲社会或各部族间的关系。^⑧

20世纪80年代末,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议题趋于多元化,但缺少原创性指导思想的问题依然存在。奥斯瓦尔德·马塞博等学者指出,这一阶段该学派实际上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性理论。达累斯萨拉姆的史学家主要转向历史案例研究,并根据研究议题的特性选取相应的理论框架。^⑨ 虽然这大幅提升了研究的灵活性,但也意味着原创性指导思想的长期缺失已使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独特性受到威胁,使之面临丧失学术辨识度的风险。

① Isaria N. Kimambo, “Three Decades of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t Dar Es Salaam”. <https://www.nzdl.org/cgi-bin/library> [2023-07-16]

② Adiele Afigbo, “On the Poverty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oyin Falola, ed., *Myth, History, & Societ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diele Afigbo*, Africa World Press, 2006, pp. 513-514.

③ Adiele Afigbo, “Fact and Myth in Nigerian Historiography”, in Toyin Falola, ed., *Myth, History, & Societ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diele Afigbo*, p. 332.

④ Arnold J. Temu, Bonaventure Swai, *Historians and Africanist History: A Critique*, p. 18.

⑤ Henry Slater, “Dar es Salaam and the Post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p. 255.

⑥ Maxmillian Julius Chuhila, “Whose History is Our History? Six Decades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anzania”, *Tanzania Zamani*, Vol. 13, No. 2, 2021, p. 33.

⑦ Joel Samoff, “Book Reviews: Issa G. Shivji,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African Law Studies*, Vol. 16, 1978, p. 167; Robert Martin,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by Issa G. Shivji”,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1, 1978, p. 165.

⑧ 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⑨ Oswald Masebo, “New Thematic Directions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90s to 2017”, pp. 66-67.

(三) 学术思想未能充分指导史学实践

以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还原非洲的历史进程,也在于通过强调非洲历史与文化的自主性,促进非洲民众在思想上的“去殖民化”,以实现非洲的独立发展。客观而言,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已在该领域付出了大量努力。不过,有学者认为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远未完成上述历史任务。虽然其提出了众多重要的学术思想,但未能将它们转化为广泛的史学实践。时至今日,殖民史仍是坦桑尼亚历史教学与科研的核心。

以麦克斯米利安·朱利叶斯·丘希拉(Maxmillian Julius Chuhila)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成立之初就决定将非洲史作为历史教学的核心,但时至今日该国的历史教学仍大量使用西方编写的教科书。坦桑尼亚的中学历史大纲仍以殖民史为教学重点。历史学者的研究议题也未真正转向“非洲人的历史”。据统计,在坦桑尼亚历史学会官方刊物《坦桑尼亚的过去》上,有多达43%的论文仍以殖民史为研究对象。甚至该现象也出现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自身的研究生培养,在1970—2021年间,其硕博学位论文涉及殖民史的比重高达86%。^①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坦桑尼亚政府对历史学科的重视不足、长期不利的经济环境、较差的生源质量等学者们无法掌控的因素。^② 欧内斯特·万巴指出,虽然很早就意识到口述史料对于非洲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即使在1974年经济环境恶化前,收集与整理口述史料也未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的核心工作。^③ 此外,虽然该学派的很多成果包含对口述史料的零散使用,但对口述史料的专题性文字整理到2021年为止仅有两部。^④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部分研究议题长期脱离群众的现实关切,降低了民众对于历史学的兴趣,间接导致了坦桑尼亚历史学会的瘫痪。^⑤

结 语

纵观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该学派是非洲史学诸流派中颇具特色的一支。在人员构成上,虽然该学派发源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历史系,但大量非坦桑尼亚籍学者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包括英国的特伦斯·兰杰、约翰·伊利夫,圭亚那的沃尔特·罗德尼和刚果(金)的雅克·德佩尔钦。在指导思想与研究议题上,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历经了多次重大变革:20世纪60年代以民族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史为主,7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济

-
- ① Maxmillian Julius Chuhila, “Whose History is Our History? Six Decades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anzania”, pp. 12 – 18, 36.
- ② E. Wamba-dia-Wamba, “African History & Teaching of History In Dar es Salaam”, p. 9; Maxmillian Julius Chuhila, “Who Writes and Reads African History and Why? Locating African Voi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UTAFITI*, Vol. 11, No. 1/2, 2014 – 2015, p. 76.
- ③ E. Wamba-dia-Wamba, “African History & Teaching of History In Dar es Salaam”, p. 8.
- ④ 两部作品分别是赛亚·基曼博对帕雷人(Pare),以及史蒂文·费曼(Steven Feierman)对阿鲁沙人(Arusha)、梅鲁人(Meru)的口述史文本整理。参见 Maxmillian Julius Chuhila, “Whose History is Our History? Six Decades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anzania”, p. 36.
- ⑤ Isaria N. Kimambo, “Three Decades of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t Dar Es Salaam”. <https://www.nzdl.org/cgi-bin/library> [2023 – 07 – 16]

史,80年代末该学派的研究议题转向多元化。在学术评价上,即使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对非洲史研究的贡献被普遍肯定,但其在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史学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学术争议。

总体而言,可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看成非洲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既代表了非洲学者在探索本土化、自主发展和批判性思维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反映了非洲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困难性。如果说以往非洲史学家的任务是证明与阐释非洲历史的“非洲性”,并为非洲的欠发达寻找历史答案,那么,随着当今议题的多元化,非洲史研究反而失去了清晰的发展方向。包括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内,当代非洲学者们往往专注微观历史议题,学术交锋不再频繁。同时,由于研究视野日渐狭窄,学者们很难将相关问题置于全球史的维度下进行讨论。在全球史迅速发展的今天,非洲史学界在该领域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此外,随着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非洲也需要加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非洲的知识精英需要对诸如中非关系等重要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但目前而言,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缺失状态。与之相反,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外部思潮对非洲原有的历史叙事造成了强烈冲击,甚至殖民史学有在非洲卷土重来的迹象。^①总之,虽然非洲史学在稳步发展,但其在全球史学中的相对地位却持续降低,未能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人才辈出且备受瞩目的时代。

2000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举行的一次历史教师会议上,一位老师问与会历史学家:“历史现在能为我的学生做些什么?”^②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是目前非洲历史学家尚未给出满意答案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在新时代实现非洲史学的复兴已成为非洲各界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

(作者曹峰毓,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王文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127)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毕健康:《殖民史学在非洲卷土重来》,《历史评论》2021年第6期。

② Gregory H. Maddox,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of African Histor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https://oxfordre.com/africanhistory/display/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34.001.0001/acrefore-9780190277734-e-314>[2023-05-30]

Hu Sheng and Chinese-Foreign Historical Exchang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 Zhang Zezhao

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Hu She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H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histor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arxist historians from China and Japan, establishing profound friendships with renowned Japanese historians like Kiyoshi Inoue. Moreover, he supported Chinese historians to explore non-Marxist historiography, broadening their research perspectives, learning from its valid elements, and expressing Chinese historians' distinct viewpoint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By doing so,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The historiographical exchange endeavors he engaged in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academic diplomacy during this period, exemplifying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Social Quality: A New Dimension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 Yu Hualin, Liang Jingh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historiography.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quality" during this period opens a unique research dimension, as this concept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value pursuits. It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specific even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in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social quality as the entry point. It explores the scope of 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social quality aiming to initiate in-depth discussions.

From "Opposition Between Two Zeitgeists" to "Clash of Method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on the Debate Between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 Zhu Xiao

Research on the debate between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has undergone three paradigms i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academia: the traditional school, the revisionist school, and the new revisionist school.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paradigm, influenced by Jacob Burckhardt, interpreted the debate as the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Zeitgeists. In the 1940s, the revisionist school, influenced by Paul Oskar Kristeller's theory on de-ideologized humanism, argued that *Studia Humanitatis* and Scholasticism were two independent but co-existing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m. In the 1970s, the new revisionist school,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Hans Baron and Eugenio Garin, not only acknowledg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t also addresse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Northern Renaissance. These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ir evolution reflect the clos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ideology i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academia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t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imes.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and Scholarly Debates // Cao Fengyu, Wang Wenqi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is an important faction of thought withi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t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1960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like Terence Ranger. This school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by deepen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Afric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further expanding its methodology,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raining historical talents. By the 1970s, its guiding ideology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Marxism, and its members launched the intense criticism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This school entered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by the late 1980s, making further breakthroughs in historical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The range of topics it addressed significantly expanded, and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s improved. While this school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t has also been widely controversial, mainly due to its excessive focus on ideology, lack of original guiding ideas and its failure to fully guide historical practice with academic ideas.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is a microcosm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How to realize the revival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issue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Africa.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Haitian Revolution Studies // Ma Weiju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Atlantic world, and its history remains a hot topic among scholars today. The study about this historical event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the “racial narrative” through the “class narrative” to the “Atlantic turn”. The “racial narrative” emphasizes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role of the mulattoes and black elites, ignoring the rol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slaves. It argues that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have succeeded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The “class narrative” highlights class conflict, believing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a class issue rather than a racial one. It transitions from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black Jacobins to that of the vast slaves. The “Atlantic turn” places importance on the “Atlantic factors” in the revolution’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mpact, believing that the Haitian Revolution, like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tlantic history and has even formed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study. This shift i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evolu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t has revitalize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both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 Cheng Weihua

Postmodernist historical theories focus on historical writing, believing that the historical text is a form of verbal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can be neither true nor false. This point of view has been fiercely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fter introducing these criticisms and post-modernist scholars’ self-defens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nd investigates theoretical shif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two representatives, Hayden White and Frank Ankersmit. By doing so, it reappraises postmodernist views. To be more specific, there are some shif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hite’s and Ankersmit’s views, which have made distinctions to some extent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fictional narratives. Yet, both of them have overlooke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rejected the possibility of “tru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s a result, they fell into the traps of historical relativism and their views may even have become self-contradictory. Compared to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idealism, scholars today need a narrative realism, which is more suitable to historical research.